

第三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返回祖国到安源

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我党的推动下，改组了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干部，我们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同志陆续应党中央的召唤提前回国。刘少奇、罗觉、彭述之、卜士奇、瞿秋白、李宗武、任弼时等都比我走得早。他们回国后，大部分都在中央担任了工作。一九二四年春，我和任岳、胡士廉、周昭秋等同志一起动身回国。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化妆分散行动，扶照来时的路线，乘火车西行，到海参崴换乘轮船，经日本长崎到上海，回到了离别三年的祖国。

到了上海以后，我按照预走的地点和联络员接上头，

通过联络员和上海党中央发生联系，党组织随即分配我回湖南工作，这样，我便回到了故乡长沙。在长沙与湖南省委接上关系后，我立即回家探望我日夜思念的母亲，不幸的是我那受尽磨难的母亲在两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养育之恩未报，甚至临别一面都未及，这使我十分难过。是的，生活在中国社会低层的劳动人民，有多少人都是这样呱呱坠地在苦难之中，凄凄地渡过了艰辛的一生，又默默地告别了人世的啊。这使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到解放了的苏联人民是多么幸福，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又多么迫切地需要这种解放。这期间的湖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正蓬勃兴起，特别以安源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开展得十分红火。不久，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何叔衡同志找我谈话，经他介绍我来到了安源路矿工会工作，和我一起回国的胡士廉、任岳也先后来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安源最早的工会领导人是李立三同志。我到安源的时候，大约是一九二四年的秋末或初冬。当时李立三同志已去上海，工人俱乐部主任是刘少奇同志，副主任是陆沉。陆沉在刘少奇同志走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任工作，后来叛变了。陆沉以后是黄静源任主任。我和毛泽民、任岳同志一起住在消费合作社的楼上，下边是卖货物的地方，上边还办了一所小学校，有些小孩子在这里读书。毛泽民同志是消费合作社的主任，胡士廉是工人俱乐部的组织股长，我是游艺股长。黄静源、宁迪卿都是工会负责人，宁

迪卿后来也叛变了。记得游艺股还有一个副股长，姓胡，脸上有麻子，是个学徒工，非常聪明能干，每次演戏他几乎都登台。安源还有个青年组织，负责人先是李求实，他在一个小学当教员，是“五卅”惨案后调走的，以后是贺昌、黄五一。安源还有党的地委组织，记得地委是一九二五年成立的，地委书记是从苏联回国的汪泽楷，任岳是组织部长，我也在地委工作过。地委不光管安源，还管醴陵、萍乡一大块地区的工作，既领导工人运动，也领导农民运动。以后，汪泽楷调走了，地委也取消了。安源早期在工人中发展的党员有朱少连、周镜泉、李涤生、朱锦堂等。朱少连是一个铁路职员，朱锦堂是一个提茶壶的工人。记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问我认不认识朱少连、朱锦堂、黄静源，可见这些同志给毛主席的印象很深。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在。

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形势很好，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有“小莫斯科”之称。那时少奇同志的工作很忙，经常代表工人与安源矿务周的资本家打交道，处理工人与资本家、工头发生的纠纷。他经常和我们一起下矿井，关心工人群众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工人群众的爱戴，工人们亲切地喊他“工人代表”。工人俱乐部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叫《安源旬刊》，少奇同志经常在上面写文章。我在安源工作的这一年，主要是做宣传工作，工作的对象主要是

青年工人。我们经常把青年工人组织在俱乐部中，通过唱歌、演戏、学文化、搞各种娱乐活动，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将青年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那时安源工人俱乐部大厦刚刚落成，我们每个星期都在这里组织文娱晚会。那时演戏没有什么剧本，都是自编自演的。我编过，黄静源同志也编过，内容都是反对资本家压迫工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演员大都是青年工人，少奇、汪泽楷、任岳、胡士廉都上台演过。看戏的人很多，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周围的农民，宣传效果很好。那时党的方针是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实行工农联盟，才能巩固工会，打倒资本家、地主、军阀、帝国主义。所以，除了在工人中间做工作外，我们每个星期还下乡一次，向农民宣传。我带着一些青年骨干到萍乡、醴陵周围的一些农村去演讲革命道理、化妆演戏，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安源，我还组织了足球队，教青年工人踢足球。每到“五一”，我们就组织工人进行示威游行，走到矿务局附近，就喊“打倒资本家”、“反对压迫工人”等口号，那时资本家方面虽然有矿警，却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因为安源大罢工胜利以后，工会有相当的威信，工农拧成一股绳，力量是很大的。在安源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与工人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使我深深体验到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和团结斗争的力量。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组织性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性，无时不在教育着我们这些初次参加革

命实践的青年人。这时候，我发现少奇同志比在苏联学习时政治上更成熟了。他遇事冷静，善于思考和钻研，能把一般现象上升到政策、现论的高度来认识，在斗争中很注意掌握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记得在安源大罢工胜利之后，在工人领袖和党内的一些同志中，滋长着一种“左”的情绪，他们认为向资本家提出的要求越高越好，在斗争中只讲进攻，不准妥协，以为只有这样才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其不知，结果还是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当时党对工人运动的指示精神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的压迫，维持安源煤矿的生产，不使工人失业，保护工人的基本利益。要充分利用工会的合法性开展斗争，保存力量，为全国培养和输送工会工作干部。少奇同志坚决执行了党对工会工作的指示，对这些“左”倾情绪进行说服教育。但这些意见被一些有“左”的情绪的人认为是右倾。当时工人俱乐部的副主任陆沉就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还有一个工人叫谢怀德，高个子，是工人纠察队队长，斗争很坚决，在工人中很有影响，但思想也比较“左”。一段时间，由于这些“左”的思想提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过高、过多的要求，不断组织工人进行罢工、游行示威，致使煤矿生产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工人被开除，有的工人生活无法维持，工会渐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工人俱乐部内意见也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很着急，他亲自下矿井调查研究，听取工人的意见，和资本家进行谈判，

写出了整顿安源煤矿生产的意见。这个意见，一方面鼓励工人团结起来向资本家作斗争，坚持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讲究斗争的策略性，改变了不可能实现的过高和过多的要求，恢复生产。这些意见对安源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我们把这些意见印成小册子，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这以后，少奇同志就离开了安源。

我们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同志，按照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每月工资不超过工人中的中等水平的工资，也就是五块钱，变了饭费，所剩无几。那时我们都很明确，就是真正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工作，谁也没有讲究生活待遇的想法。少奇同志的爱人何宝珍同志那时也在安源，她刚生了小孩，和少奇同志住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楼上，他们也同样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何宝珍同志很识大体，也很有能力，对同志很热情，她与少奇同志的感情很好。可惜后来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壮烈牺牲了。

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奋起声援。安源工人俱乐部领导所属一万三千工人，开展了颇有声势的罢工、游行等声援活动。工人俱乐部还发起了捐献活动，在各界、各阶层以及工人中，动员捐献钱、物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六月，安源党组织派我为代表，携带几万元捐款和慰问信，去上海慰问。

我到上海的时候，正是上海工人阶级坚持罢工斗争的高潮，到处可见游行的人们，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歇业。我找到上海总工会，将款和慰问信交给了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时刘少奇、李立三同志都在总工会。上海工人的革命斗争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市民的支援，使我们感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感到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

我去上海之前，听说毛泽东同志要来安源。我从上海回到安源的时候，大约是七月份了，听说毛泽东同志来过，住了一两个晚上，召开了一个会议，参加的人是俱乐部的委员，因而只有少数人知道，事后也没有宣传。毛泽东同志这次来，进一步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要纠正“左”的做法，注意利用工会的合法身份，不要忽视合法的斗争。这些都是我从上海回来后听工人俱乐部的同志讲的。

安源的工人运动一直是属于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安源的干部调动，也是归潮南省委。我从上海回到安源后不久，就接到省委的通知调去广东工作，和我同行的是毛泽民同志。我们到了长沙，恰好碰到毛泽东同志也在长沙。他从上海来，也准备去广东。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同志在文化书社的楼上请我们三人吃了饭，为我们饯行。此后，我和毛泽民走水路，经上海去广东。毛泽东同志走旱路去广东。我离开安源后一两个月，安源工人俱乐部就被军阀

破坏了。后来我在广东韶关任国民革命军二军六师党代表时，接待过一批安源的工人去广东，其中有一个姓袁的小鬼，很好，我留他当了公务员，跟了我一段时间。从这些同志那里我得知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被破坏的情况。听说是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同志在俱乐部开会，得到情况说军阀部队要来抓人，大家立即转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同志硬是不走，他誓死要和军阀斗争到底。结果转移的同志都脱险了，黄静源同志却被捕英勇牺牲了。在当时我们的同志中，确实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以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最光荣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是永远值得颂扬的。但今天看来，有些牺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时我们的党没有武装，手无寸铁，以血肉之躯和毫无人性的、武装的军阀相对抗，只能是以卵击石。我们的党正是在这些血的代价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走向成熟的。

出 师 北 伐

我与毛泽民同志经上海来到广州的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五年秋天。

在广州，最先见到的是党派来接我们的陈赓同志。陈赓同志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当时是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的秘书。那时他年轻有为，举止洒脱，

有良好的军人姿态。一交谈，方知他也曾在长郡中学读过书，这使我们倍加亲近。开始，我住在东山，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在其领导下做些工作，当时的省委书记是陈延年同志。过了不长时间，周恩来同志与我谈了话。要我准备去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一九二五年冬，广东革命政府将所属部队政编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孙中山、廖仲凯“以俄为师”，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因而迫切需要一批同志去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恩来同志介绍我认识了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党代表，他听说我是苏联留学回来的，又是湖南人，如获至宝，要我去二军工作。那时在国民革命军中，由于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苏联特别尊敬和崇拜。有了留苏这一身份，工作起来有不少便利条件。不久，即调我去国民革命军中工作，正式任命为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还授了中将军衔。随即去韶关任职。

二军的前身，是谭延闿的湘军。这支部队是在一九二三年谭（延闿）赵（恒惕）战争时从湘军内部分化出来，南下广东依附于孙中山，政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鲁涤平任副军长，军、师部有苏联顾问。下辖四、五、六三个师及教导师。由张辉瓒、谭道源、戴岳和陈嘉佑分任师长。还有一个炮兵团，团长是谢慕韩。谭延

阎当时是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那时他还属于国民党左派。由于旧军阀部队受地方主义的影响较深，为了方便工作，我党派往第二军做党代表的李富春同志、四师党代表李六如同志、五师党代表方维夏同志和我均是湖南人。方维夏、李六如同志当时已是湖南久负盛名的革命前辈了，而我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

我到六师时，六师的师长是戴岳，副师长是朱耀华，我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有一个苏联顾问叫朱柳史切维奇，大家都简称他为“米柳史”。下辖三个团：十六团团长黄友鹄，十七团团长廖新甲，十八团团长刘风。还有一个特务连，一个机枪连，直属师部。戴岳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一九一六年曾在天津参加过秘密倒袁活动，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政治上主要是紧跟谭延闿。我初到六师时，他向我表示拥护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支持政治部的工作。他们那时对政治工作并没有多少认识，但感到政治工作可以使士兵积极，博得民众支持，确实帮了他们的忙，所以也是赞同的。在北伐战争期间，我们基本上能相互尊重，协同指挥，合作得是比较好的。但在后期，他逐步看到共产党政治工作的威力，出于戒心和防范，派了他自己的一个秘书到政治部工作，准备取代我们。蒋汪合流后，也就倒向了国民党右派。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逃往台湾，他留在大陆。湖南解放后我们在长沙又见了面。二十年沧桑，他感慨万千。

我到六师后，即着手建立各级党代表制度，组织政治部。那时我们党内曾有明确指示，就是共产党员不当军事指挥官，在部队不设党支部，不发展党员。主要任务是做政治工作，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反帝反封建，改革部队旧的军阀制度，扶助地方工作，团结这支部队，使之不断的革命。所以，公开的共产党员都是做政治工作的。师里设有政治部，除了我兼任政治部主任外，还有一个秘书姓沈，是共产党员。政治部设宣传科、党务科，记得党务科科长姓李。还有一位姓何的科员，是共产党员，北伐期间曾多次留在地方帮助筹建国民党县党部。还有一个宣传队，多由青年学生担任宣传员。团、营、连各级都设有党代表，叫政治指导员，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军官。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我已叫不出名字了，只记得十八团的团党代表叫谢华。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的各级组织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但他们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人民是永志不忘的。党当时着重强调的方面，是以团结合作为主。我们下边工作的同志，虽然对党的一些指示（如不当军事指挥员、不设支部、不发展党员）有些不同的想法，但那时年轻，头脑也简单，认为是党的指示，也就不提什么意见。实际上，为了开展工作，师里设有秘密支部，也开会过组织生活，研究一些党内的事情，传达党的指示，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党员实际上也发展了。这些都是秘密的。北伐前，二军各

级组织中又补充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不少是我党有计划地派进来的党、团员，成为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那时，在国民革命军中，除了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以外，二军政治工作人员的数量是比较多的。

六师中的官佐，大部分是旧军官学校出身，军阀习气较重，拉帮结派，欺压士兵；士兵中大多数是家庭破产的农民、工人和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当兵吃粮，雇佣思想严重，又沾染了不少旧军队的恶习。官欺兵，兵扰民，纪律很差，战斗力也较弱。因此，我们到部队后，首先抓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宣传三民主义，主要讲解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二是宣传孙中山的遗嘱，以灌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是对部队实行民主政造，实行经济民主，不准扣兵饷，不准喝兵血，废除肉刑等封建制度，提高士兵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和各级政工人员、共产党员，经常深入部队，主要做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教育工作，使他们觉悟、进步，成为发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对同级官佐主要做团结工作，在团结的基础上给以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经过教育，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意义，逐渐懂得了为什么打仗的道理，有了初步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部队废除肉刑、体罚，不打不骂士兵，不吃空额，不喝兵血，成立军需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等民主政革后，士兵们精神焕发，积极性高

涨。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有了改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纪律也严格起来。当然，在当时要想对部队实行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军阀部队很讲帮派、义气，动他一兵一卒都行不通。但进行这些改造，受到士兵的欢迎，上层军官们感到政治工作有威力，能使士兵积极、努力，听从指挥，提高战斗力，起到了他们所起不到的作用。因而也尊重我们的工作，愿意与我们合作，整个部队面貌有了改变。不久，我们就出师北伐了。

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是出师湖南、湖北，以消灭吴佩孚为目的。准备在两湖取胜后，再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的部队。尔后视机向长江以北发展，消灭张作霖。具体布署是：以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二、三军为右翼，策应正面，监视江面的敌人；六军、一军的一、二面师为总预备队。兵力如此配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唐生智的八军在湖南倒戈反吴，考虑到其与二、六军过去因谭赵战争时的旧怨来解，不宜协同。而四、七军则与八军同属保定系，关系较好，且兵力较强，共同担任主攻，易于协同。至于一军的两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配置为预备队，以保存实力待机行事。因此，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从北伐战争之初，就是矛盾重重的。

我们六师和四师于七月七日从韶关出发（五师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而的警戒任务），沿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北进。七月中旬，按照总司令部的命令，集中于

茶陵，任务是监视江西，策应醴陵。一路上基本没有什么战事。部队作为正义之师初上征途，士气高昂，纪律也比较好。我们除了行军外，按照军里的宣传大纲，不断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激励他们认识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这支部队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全体官兵都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叫做以俄为师，实行“军队党化”。因而各级都设国民党党部和党小组，党部有执行委员，党小组有正副组长，强调“注意党的工作”。这实际上多数成为我党做公开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那时，每天早上队前要背诵“总理遗嘱”，每驻军三日要举行党小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的周会，主要官长要进行讲演，反复宣传三民主义，以孙中山的遗嘱号召全体官兵勇敢战斗。我那时虽然年轻，但刚从苏联回来，学得许多“新名词”，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啊，“革命胜利后人民当家作主，象苏联那样……”等等，对这支从来有过政治工作的部队来说，可谓闻所未闻。他们听了感到十分新鲜，也十分有道理。革命的政治工作对改造旧军队的作用是很大的。出师以来，部队还特别强调遵守纪律，我们六师还曾以“不怕死、不扰民”制定官兵的臂章，强调革命军是为教民于水火之中而出征的，要求不扰民、真爱民，搞好军民关系。对于严重违纪的就给予坚决的处分。如部队过汝城时，十六团团长黄友鹄私自向地方抽税二、三千元，就受到撤职处分。当然，对于一支初

经改造的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不能以人民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

北伐军挥师北上，第一次做为革命军汇合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从出师以来，北伐军每天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的支持。人民相望于道，箪食壶浆以迎，送信带路，倾力相助。特别是在茶陵，给部队教育至深。因为这支部队当年作为湘军时，就曾在此地驻防。部时由于军队纪律不好，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深遭民众痛恨。在湘军离湘赴粤时，已是孤立无极了。而此次作为革命军旧地重返，官兵还是当初的那些官兵，但由于政治工作的作用，纪律严明，扶助农工，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礼遇。官兵们第一次感受到唤起民众的力量，感受到正义之师的光荣，无不感慨万分。连鲁涤平都说：我们此次出发由广东到茶陵，沿途可见这种欢迎，并不是因为我们初到或害怕我们，不得不出来应酬一下，而确是认识我们是真正保护他们，为他们谋利益谋解放的，是很诚恳而出于自愿的。……这是何等荣幸的事。然而，他们所不甚明了的是，这些人民群众出来欢迎、支持、援助北伐军，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的结果。

出师以来，政治部的工作也特别活跃。每到一地，便派出宣传队上街贴标语，组织演讲，宣传民众。师政治部与地方联合召开规模较大的军民联欢会，大造革命舆论，

向人民群众宣传北伐的意义，宣传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道理。还帮助改组当地的国民党党部。成立群众团体，斗争土豪劣绅，扶助工农群众。沿途均留下部分政工人员指导工作，组织民众，有的则参加当地的国民党党部工作。工农运动支援了北伐战争，而北伐战争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对于革命的政治工作，部队中大多数官兵是乐于接受的，但也有一些人说怪话，如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膏药的”。对此，我们除进行教育外，广大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战斗中身先士卒，影响广大官兵，逐步改变一些人的看法。总的来说，北伐之初，在六师中，我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

在茶陵休整一段时间后，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便向赣而进军了。

南昌之战

国民革命军的四、七、八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大破吴佩孚主力，兵临武汉之时，战局发生了变化。占据闽、浙、赣、苏、皖五省的孙传芳，改变其坐山观虎斗的方针，调兵遣将，以十万大军入赣，妄图利用江西这一“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战略地位，一箭双雕，即打退北伐军，又赶走吴佩孚，以收渔人之利。孙传芳的这一举动，严重影响两湖的战局和广东后方的安全。因此，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

是以江西为主攻战场，消灭孙传芳。兵力部署是：第三军和第二军四、六两师自醴陵、茶陵、攸县进攻赣西；六军和一军一师向赣西北进攻；新收编的赖世璜部与南雄、汝城的二军五师、五军四十六团进攻赣南，牵制敌人。

九月六日，总攻开始，我师十七、十八团参加萍乡之战。十六团则由朱耀华副师长（兼十六团团团长）率领从茶陵出发，负责驱逐莲花之敌。当时，萍乡有敌唐福山、张风岐部共六、七千人。然而，由于北伐军声势逼人，锐不可挡，稍有接触，敌人就胆战心虚，望风而逃。我军于当日进占了萍乡。萍乡人民欢迎北伐军的情景是非常热烈的。该县县党部及各界团体在县大西门外校操场开了大会。那天烈日高温，而到会者极其踊跃。小小的萍乡县城竟汇集了五、六千人，二军党代表李富春，三军党代表朱克靖，还有四师的副师长和我，均在大会上做了演说。宣传北伐的意义，宣传北伐军的革命性质，号召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工农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代表人民痛斥北洋军阀的腐败，揭露贪官污吏欺压人民的暴行，表示拥护革命军，与之共同奋斗的决心。言者慷慨陈词，听者为之动容。广场之上呼声、掌声雷动，情绪之热烈，场面之壮观，令人感动。

占领萍乡后，北伐军继续东向，跟踪追击唐福山部，攻占了宜春、分宜，逼进新喻。这时，北洋军阀的江西都督邓如琢从南昌赶到前线督战。在分宜至新喻之间，据险

布阵，企图顽抗。这是二军自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硬仗。我们正面是地势险要的敌仰天岗阵地。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军、师、团党代表都亲自上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由于多次冲锋不克，军部命令我师由袁水南岸迂回至敌人侧后。不料部队的行动被敌人发现了，他们立即增兵向我师反扑。当时，我师的十六团和十八团一营出击莲花、永新去了，兵力不多，阵地几次险被突破，情况十分危急。我与戴师长亲临第一线阵地，镇定地指挥部队，鼓动官兵们英勇杀敌，坚守阵地，终于打退敌人反扑，与正面突击的部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仰天岗终于被攻占。

新喻攻下后，敌人如惊弓之鸟，溃不成军。邓如琢见势不妙，逃向抚州。入赣仅半个月，二、三两军连克萍乡、宜春、莲花、永新、分宜、新喻、万载、上高、清江、安福等十一个县，战事发展十分顺利。

部队打下清江以后，我们六师得到了军部的通报。六军和一军一师袭占南昌后，由于孙传芳增兵反扑，我袭击南昌的部队势单力薄，致使南昌城得而复失。当时，二军五师还在赣南攻打吉安，我师与四师奉命攻打樟树。樟树攻下以后，邓如琢退居南昌城，通电辞职。我二军各师遂向南昌进发，追击残敌。这时，蒋介石也赶到前线，部署第二次攻打南昌。

南昌之战是整个江西战场上最关键的一仗。胜败关系全局。孙破则不但不能保江面，江浙也要动摇；而我敌也

不只是危及湖南、湖北，就是广东也很危险。因而从一开始，双方都拿出主力，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为攻下南昌，军党代表李富春同志还召集政治部会议，要求政治工作人员要将工作做到实处，要使全军官兵懂得攻下南昌的意义，明确肩负的责任。我们各级政工人员，都努力工作，宣传北伐的形势，鼓动官兵的士气。

第二次攻打南昌的部署是由三、六、七军及一军一师攻占南浔路敌各据点，切断南浔路，阻挡北来援军；由二军五、六两师和一军二师攻打南昌城；四师为预备队，警戒抚州方面之敌。然而战斗开始后，北线作战不利，各军协同不好，未达预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没有及时调整作战计划，仍旧命令我们按原计划攻城。

十月十日发布命令：二师攻北边得胜门；五师攻东边永会、朝阳门；我六师在西南以主力进攻进贤门，另以十六团绕攻惠民门。十二日拂晓各部同时发起进攻。当时，各团挑选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架梯登城。由于敌人火力过猛，几次爬城均未奏效。在惠民门，十七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一营在攻击前进时，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住，全营进退不得，情况非常危急。此时，十七团团长廖新甲牺牲。戴师长和我到惠民门附近的机关枪阵地，指派第二营营长李月峰代理团长，并调集各部火力，压住对方，使全营脱险。南昌城西南一带民房低矮密集，敌人为了便于发扬火力，竟放火烧尽城

内大片民房，给南昌市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我全师官兵目睹敌人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这时，由于北边敌卢香亭部打通了南浔路，损兵源源开来，南边抚州之敌刘宝题、陈修爵部也蠢蠢欲动。我军屯兵城下，背水作战很不利。总司令部决定调整部署，撤围南昌。

二攻南昌的教训，说明了切断南浔路的重要。于是经过短期休整后，总部部署了南浔路大决战，我们二军以五、六两个师协同十四军（赖士璜部所编）攻击抚州，切断南、抚之间的联络，以六师渡赣江，经松溪，万寿宫，参加南浔路总攻击。我师的任务是增援三军攻击牛行车站。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郑俊彦部拚死向我阵地反扑，几乎将我们包围。我和戴师长、米柳史顾问均在前线，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我们四周。经过一周的浴血奋战，我师占领了牛行车站。这时，南浔路已被友军层层戴断。南昌敌人见败局已无法挽回，便于夜晚偷渡赣江，向东北方向逃窜。我师奉命为先遣追击队，渡江跟踪追击。部队在鄱阳湖畔的河道港叉之间昼夜兼程，终于在涂槎追上了逃敌。这时，白崇禧率部队也赶到涂槎。这次让白崇禧发了大财。这股逃敌本来是我们师追的，可是由于十八团团长刘风貽误军机，没有及时追击缴械，结果，郑俊彦、张风岐所部共两万余人及其枪械，全部被白崇禧缴了去。戴岳师长为此十分恼火。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十一月八日南昌城终于被攻

下。胜利来之不易，据当时统计，入赣以来二军共伤亡官兵二千余人，其中政治工作人员二十余人。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发表的《第二军最近状况》记载：“下级干部及士兵的精神颇锐，从二月的作战精神看来，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之九是政治工作力量。”

进军闽北

在南昌方面战事紧张之际，福建军阀周荫人改变了援赣计划，转而向广东进攻，妄图袭击北伐军的后方。十月初，福建战场开辟，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由于一军排斥了共产党员，所以战斗力很弱，被周荫人打得大败。后幸因敌内部发生分化，周荫人才不得不退出广东，向浙江撤退。南昌攻克后，北伐军损失较大，不能马上东下取江苏、安徽，于是决定派赣世璜十四军及二军六师协助何应钦攻取福建。大约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也就是在涂槎解决敌人后不久，我师接到总司令部南下策应何应钦，与十四军共同截击周荫人部的命令。从这时起，六师脱离二军在闽北单独执行任务一个多月。直接受十四军指挥（其军长赖世璜因病留赣休养，由副军长兼党代表熊式辉指挥），总的受命于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

我师沿临川、资溪、光泽、邵武挺进，由建阳直趋建瓯。副师长朱耀华率领十六团为先头部队到建瓯时，守敌

见我们兵少，企图抵抗。我和戴师长一商量。率领特务连赶到城内，虚张声势，限期四小时内缴械投降，可以保证生命与个人财产的安全。敌人不知虚实，也慑于北伐军的巨大影响，便缴械投降了。与此同时，十七团在党城截击敌人，歼灭约三千逃敌。十八团在政和一带截击敌人。十八团团长刘风指挥部队打了一仗之后，没有抓住时机追击残敌，致使周荫人亲率的一部得以从松溪、政和窜入浙江境内。戴岳对刘风再次贻误战机非常恼火，与我商量要撤他的职（当时条例规定，主官发布命令，必须有党代表附署）。刘风这个人不仅军事上不太听指挥，一再贻误战机，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反动。于是我们便撤了刘风的职，政派洪汉杰代理团长。另外，敌驻闽北的何麓崑部三千余人，主动与我方洽降，被收编。至此，闽北之敌除周荫人所率一部得以逃脱外，其余全部械解决。六师浩浩荡荡开进建瓯。这时，熊式辉从福州何应钦处归来。向我师传达了“暂时休整待命前进”等指示。这样，我师便在建瓯驻防一月有余。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戴岳回忆，熊式辉从何应钦那儿回来后，在与戴岳交谈时，曾问到“肖党代表是C P，还是C Y？”当戴说“是共产党”，并说了一番赞许共产党的话之后，熊式辉露出非常惊讶的样子。估计是对戴岳的试探。熊式辉是比较反动的，他趁赖世璜因病滞留江西之机，改编了赖的部队，以后在“四、一二”政变时，他与何应钦的部队都成了蒋介石的别动队。

北伐军进入建瓯后，即逮捕了伪县长，解散了欺压百姓的保安、警察武装，帮助地方建立了县行政委员会，推选了委员。师部驻在被接管了的帝国主义天主教堂里，并约法三章：不拉伕、不筹饷、不强住民房。深受人民的欢迎。为了宣传和发动群众，师政治部在城北广场主持召开了庆祝北伐军胜利进军大会。这是每到一地几乎都要做的事。我作为师党代表，在会上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叙述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出师北伐的胜利经过，号召国民组织起来，为谋求自由、幸福而斗争。由于语言不通，还有一个当地的同志作“翻译”。会上还枪毙了一个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首恶分子。我们还帮助建瓯县筹建了国民党县党部。这也是我们党代表、政治部在北伐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到一地，没有县党部的帮助筹建，已经有了的进行改组。不管是筹建也好，改组也好，实际上是把腐败的国民党的县党部变成了有共产党参加领导的县党部。这样，我们走一路，改造一路，便把革命的火种播撒了一路。建瓯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县党部成立后，除了帮助我们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外，还公开组织县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斗争土豪劣绅、取缔奸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扶助工农的活动。一时间，建瓯县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一九二七年一月底，我师奉命离建瓯赴浙。临行前，

我与戴师长开会向地方各界人士告别，并以师部的名义捐款二千元，倡议建设黄华山公园，以留纪念，并扩大北伐的影响。今天黄华公园依然座落在建瓯县黄华山的万绿丛中。它是北伐战争的一个见证。

攻克南京

在我挥师东下闽北助何期间，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了。攻克南昌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主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为了把持国民政府，却硬要迁都南昌。这场争论，使蒋介石的个人野心进一步暴露。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决定分东、中、西三路向长江下游进击，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的。四、八军为西路军，集结于湖北孝感、黄陂，监视河南张作霖军阀部队；二、六、七军为中路，沿长江入皖东下；一军为东路，由闽入浙北上；三军仍在江西为总预备队。蒋介石如此配置兵力也是出于一定的目的。自北伐开始以来，蒋介石的嫡系一军屡屡败北，在整个战场上声名狼藉。他要达到个人目的，不得不求助于他军。因四、八军与蒋间隙较深，势力较大，足以与蒋分庭抗礼，蒋就转而拉拢二、三、六、七军。与李宗仁拜把兄弟、让朱培德镇守江西，二、六军因与八军有旧怨，蒋也乘机拉拢，让其担任长江下游战场的主攻。当时，我党从全局出发，力图减少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

间的冲突，共助北伐大业。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也是努力促进团结，以大局为重，同时积极发动民众，壮大左派势力，同蒋做必要的斗争。

这时，我师尚在建瓯，仍接受东路军指挥，参加杭州会战。由于友军作战不利，东路军退至衢州附近，孙传芳派孟昭月增兵反攻。我前敌指挥部决定在衢州附近一战。我师奉命经浦城、越仙霞岭，与江西过来的四师会合担任左翼，攻打水亭和诸葛镇。这也是一场鏖战，炮火昼夜不停。胜利那天，巧逢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的生日。早餐时，我们师部备了简单的酒肴，为其祝贺。米柳史切维奇兴高采烈地说：今日定破敌军！饭后，我们一起去前线。战斗又进行了一天，直到黄昏，才将敌人阵地突破并包围起来。但未等解决，总指挥部又命令我师迎击寿昌方面的白宝山、冯绍闵、刘宝题的部队。我们一直将敌追击到皖浙边境，敌人是兵败如山倒，我们却似猛虎下山，何等痛快淋漓。此时，大军正会攻杭州，我师又折回遂安，入徽州，担任肃清外围的任务。那正是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后。正月初一路过遂安县时，当地进步青年在我军进城之处设立“遂安县革命军队过境指挥所”，专为军队搬桌凳、运稻草、雇挑夫，十分热情。

杭州即下，孙传芳的势力仅剩沪宁一隅。北伐军乘胜追击，中路军以七军为江左军，二、六军为江右军，加上一些新收编的地方军阀部队一起，与敌在南京外围展开了

激战。这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应孙传芳的要求南下渡江增援，敌我相持，战争成胶着状态。我师从皖南经宣城、高淳、溧水向南京冒雨奔袭。连日来风雨交加，道路十分泥泞。三月十九日，赶到秣陵关。军党代表李富春同志亲自赶到迎接，向我师官兵表示慰问，并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第六师赶到，南京指日可下。第二天，我与戴师长一起到第一线视察敌情，发现敌人一线城垣阵地极为险要，仰攻不易，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出其不意袭击牛首山（也叫牛扁担山）东敌人阵地。突破以后，又绕敌侧背，前后突击，追敌退至二线。接着我师乘胜追击，攻占了雨花台。三月二十四日晚，我二、六军等部队先后入城。南京城终于被攻下。当晚，美、英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侵害，下令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轰击，造成了“南京事件”。

第二天拂晓，我与戴师长率特务连在城内巡视，维持秩序，派哨派岗，组织南京市的卫戍工作。大概在一两天后，我与戴岳在师部接到下关驻守卫兵的报告，说蒋总司令的兵舰泊在下关。我俩一面向军部报告，一面动身赶至下关。蒋介石的船不大，是一艘炮艇，人也不多。当时我们既不知蒋介石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儿去，只是感到总司令来得突然。我俩上艇坐了一会，蒋介石询问了几句南京市的情况，我们作了回答。我们请他上岸，他说有事要去上海，马上就走，不上岸了，让我们转告军领导。等

鲁涤平等来到江边的时候，炮艇已离开码头走了。时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大家心里都很不快。因为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对蒋的个人野心，鲁涤平他们都早有看法。这次路过南京而不上岸，更加深了这种隔阂，当时军师领导人中就有“蒋对我们二、六军不放心”的说法。以后才知道他急匆匆去上海原来是勾结帝国主义搞反革命政变的。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嘴脸，当时我们都有一些察觉的。过去在广州就听说过中山舰事件，北伐以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感到蒋这个人讳莫如深，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对蒋介石有可能要叛变，在党内有所议论，在党外，我们与鲁涤平、戴岳他们交谈中也有所议论。记不清是在那一天了，上海党中央派彭述之到南京来。彭述之从下关登岸后，问岸上的士兵都是六师的人，便打听我在那里，士兵将他送到师部。我认识彭述之是一九二〇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的时候，以后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他做过我们支部的负责人。我们见面后，彭说有事要召集个会议，当时，李富春同志已离开南京，彭便让我做召集人。那次会议是我主持的。李六如、方维夏等军队中党的主要负责干部、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和一些地方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谢文锦也是与我一起留苏的同学，彼此很熟）。会上，彭述之介绍了上海的形势，总的意思是革命形势不错，党领导的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已取得胜利。但帝国主义还在联合，想从内部分化我们，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

党中央在上海采取了一些措施，组织了工人武装，力量很强大，并说有信心、有把握控制局势。但对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怎么办，是否要准备应变，一点也没有涉及。第二天，彭述之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想到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党没有充分估计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的危险性，没有领导全党采取果断的措施，组织从各个方面与蒋介石作斗争，只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以致在蒋搞突然袭击之时，我党措手不及，从而断送了大革命的成果。

转 师 武 汉

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结合在一起，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他接受了帝国主义及上海买办资产阶级赞助其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大量经费。这样，蒋介石一方面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有了帝国主义作后台老板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自感羽毛已丰，便加速了反革命政变的步伐。他首先委派白崇禧掌握江浙两省的军事，接着又把黑手伸向了南京。他认为南京的二、六军不是自己的左膀右臂，疑心将成为他投向反革命的一大障碍。于是采取阴谋手段，以拉为打，剪除异己。他先命令二军渡江追攻，名义上是继续北伐，实际上是调虎离山。接着，派其嫡系何应钦的一军薛岳师

进驻南京。遂在六军进行“清党”、缴械、改组。把二、六军彻底挤出南京。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当时，我们在二、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是努力促使二、六军倒向武汉国民政府的。林伯渠、李富春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下边的工作人员，也针对二军中的反蒋情绪，从侧面吹风。记得部队过宣械时，我与戴岳乘小舟在湖上谈心。当分析到北伐军的前途时，我说，孙传芳已成釜底游鱼，攻下南京是不成问题的。可虑的是蒋介石野心勃勃，姿意独裁，恐怕与革命不利。并透露了现在不少军师领导人都在共商对策。戴岳亦表示同情和支持反蒋斗争。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排挤二、六军已成事实。鲁涤平还在莫愁湖请客，我和戴岳、朱耀华都去了，其他师的领导张辉瓒等人也都去了。席间也商谈了如何反蒋独裁的问题。当时，程潜、鲁涤平的决心还不很坚决，各有自己的打算。戴岳曾向鲁涤平建议与六军一起固守南京，与武汉方面联合讨蒋，但鲁涤平以程潜赴汉口无人主持为辞拒绝了。

二军渡江以后，在乌衣镇一带集结。当时是北上还是回宁讨蒋，估计在领导层中不太统一。后朱，武汉方面指示我二军回南京，协同六军卫宁反蒋。于是，李富春同志让我和黄鳌同志带几名同志返回南京，与江苏省委书记谢文锦同志联系，搞一部分船只，准备接二军渡江回南京打

蒋介石。但后来武汉方面又改变了计划，要部队去武汉。时二军已北上，在津浦线与直鲁军展开激战，前锋打到蚌埠。二军孤立无援，蒋介石阴谋假手直鲁军消灭二军。形势险恶，延宕就等于坐以待毙。鲁涤平、李富春在前线召集师以上干部会，我党同志坚决主张讨蒋。鲁涤平等人也出于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愤恨，以及武汉方面的老上司谭延闿的召唤，一致通过移师面行，与武汉政府联合讨蒋的主张。当时在二军内部，国共两党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在共同讨蒋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于是，全军经全椒、含山、巢县、庐江、太湖向鄂东前进。

在此期间，我和军政治部主任黄鳌等八人在执行搞船的任务。我们先到了浦口，找到浦口船船工会，把船只调集到江北，然后又渡江回到南京，找谢文锦同志研究部队如何渡江的问题。这时南京的形势已是十分险恶了。何应钦的部队进驻南京后，把六军缴了械，正在实行“清党”。我们几个也差一点被抓。谢文锦同志也没有找到（后来听说他被捕牺牲了），南京已不能久留。我们得知部队已向武汉方面转移，便从南京南门出城，当天抵安徽当涂县。后经芜湖、宣城、歙县、休宁到景德镇。路过景德镇时，正是一天中午。当地的反动民团排斥工农武装，发生了争斗，形势很紧张。工农武装被赶了出来，派人找到我们，要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一行八人从南京出来，正憋了一肚子气。决心打他们一家伙，支持一下工农武装，同时也出

出气。于是，我们八人以北伐军要夫子挑行李为名，进了民团团部，工农武装埋伏在外面。我们进去一看，团丁们正在睡午觉，一开枪，他们晕头转向，四下逃窜。工农武装乘机冲进来，把民团的武器都缴了。

从景德镇到九江，听说部队在宿松、黄梅一带，我们便过江追上了部队。当时，军部和四、五师驻黄梅，六师驻宿松。奉武汉政府之命在此休整待命。在宿松天主教堂，我师召开了讨蒋大会，我与戴岳均在会上讲话，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群情激奋。军部在黄梅还举行了第二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记得中共中央赠送了挽联：“二军之功名已把吴孙打倒了；吾辈之责任果能擒拿蒋张么？”

不久，二军奉命开往武汉，我们从藕池口登船，到达武昌，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这时武汉的形势已经比较复杂。汪精卫表面上是左派，而在暗地里与蒋介石勾结，准备反共。军队中也比较复杂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斗争土豪劣绅的消息不断传来，二军中的军官不少是湖南的地主豪绅子弟，家里来人来信均影响着军队，引起他们对农民运动的反感，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阻力也大了。当时，郭沫若同志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我们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就拿着小册子在部队宣传，揭露蒋介石的叛变嘴脸。这在当时下级官兵中还是欢迎的。但宣传打倒土豪劣绅，他们就有些反感，尤其是

在军官中。马日事变以后，四川军阀杨森与夏斗寅勾结，进攻武汉。六月，鄂西战役开始。我所在的六师在仙桃镇将杨森部击溃。乘胜追击到沙市、宜昌。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宁汉合流。国共合作到此最后破裂。中共党员奉党的命令陆续撤离部队，撤离时是由党秘密通知分期分批走的。军里的李富春、黄鰲同志比我走的要早。不久我也接到党的通知去汉口。蒋介石叛变以后，武汉政府的财源一直很困难，军队的薪饷也不能如数照发。我虽是师党代表，但是身无分文，真可谓两袖轻风。师政治部有一些公款，我们一个也没动。为了筹措路费，我托人将我个人的两支马枪卖掉。临行前，我去看过戴岳，他知道我要走，却一点表示也没有。和我一起离开六师的还有刘隽、朱学伊同志，我们从宜昌乘一艘日本船到达汉口，从此便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我离开部队以后，六师由鄂西开赴长沙。据戴岳后来回忆，一些留在六师的共产党员到湖南后遭到何键的清乡督办署的疯狂迫害。第十八团连长雷鸣皋被追捕枪杀，团副戴文被判处徒刑三年另六个月，第十七团营指导员戴世荣被迫躲避到邵阳乡间，不久也死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